

遼代薊州地區佛寺碑刻造像流布與信仰調查研究 ——以千像寺為中心¹

王璿

摘要：本文以田野調查、材料比較、文獻梳理為主要研究方法，通過對未經學界深入發掘的千像寺造像群的分佈形態、藝術特徵和密教影響進行分析，對比相近時期留存的佛教遺跡，對遼代古薊州的佛教流布、信仰情況做一研究，以期對該地域佛教信仰特點有更全面的認知。

關鍵詞：薊州、密教、碑刻、造像、佛教信仰

¹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印度古典梵語文藝學重要文獻翻譯與研究”（專案批准號：18ZDA286）的階段性成果。

薊州區現為天津市的一個行政區，建國後屬河北省一個行政縣，後劃歸天津市，2016年7月28日改薊縣為薊州區。據學者楊志玖的研究，古薊州“是唐玄宗開元十八年（730年）把幽州的三個縣（漁陽、三河、玉田）分出來設置的，治所在漁陽縣……天寶元年（742），薊州改稱漁陽郡，肅宗乾元元年（758），又改稱原名薊州（《舊唐書》卷三十九，《地理志》）。”²物產豐饒，地位險要。從隋唐至明清古漁陽的盤山一直是帝王、文人參佛觀光的勝地。薊州區現存遼代佛教建築遺跡主要為獨樂寺觀音閣，始建時間不詳，一說建於隋，李白署書“觀音之閣”，清人朱彝尊（1629–1709）在《日下舊聞》中記載遼時曾重建，經梁思成先生發現研究，撰寫論文《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1932年發表於《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3卷第2期，引起學界、社會關注，寺廟得以保護完備。另有佛塔四座，分別為光佛舍利塔，塔為八角三級亭式，始建於唐延和年間（712），遼太康年間（1075–1084年）曾修葺；漁陽郡塔，俗稱白塔，據梁思成考據原與獨樂寺一體；天成寺古佛舍利塔為八角十三層密簷式，始建於唐代，遼天慶年間（1111–1120年）重修；以及福山塔，為遼代閣樓磚塔。而這一時期的佛教造像僅存千像寺石刻造像群。

此地曾經的佛教重鎮的地位未能被學界普遍關注，部分佛教文物沒有受到很好的保護，尤其對遼代薊州地區佛教文化的綜合分析有待深入。有研究文章指出對盤山周邊的佛教造像石刻的保護應注重整體環境，樹立“大遺址”的概念³，所以本文以盤山千像寺為考察重點，對比同時期其他地域佛教遺存，以田野調查、文獻梳理相

² 楊志玖《關於漁陽、範陽、薊縣的方位問題——並論〈重修薊縣志〉的錯誤》，《天津社會科學》，1983年第2期，第61–63頁。

結合的方式，對千像寺佛教造像、碑刻作一研究，進而對遼代古薊州盤山一帶佛教信仰進行分析。

一、千像寺碑刻造像保護、研究情況調查綜述

遼代薊州遺存的佛教碑刻、造像散佈在以盤山為中心的各地，資料收集難度較大。筆者走訪了千像寺的遺址，對其所存留的碑刻、造像保存情況進行了梳理著錄。

千像寺位於盤山東麓，始建於唐，稱為祐唐寺。現遺址存有遼統和五年（987）所立的“盤山千像祐唐寺創建講堂碑”⁴（後簡稱“講

³ 天津市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的副研究員蓋佰國、張俊生、劉健在《天津市千像寺造像保存現狀及綜合保護構想》一文中指出：“制定保護規劃時，應注意東、南兩個方向占壓的別墅以及造像群西部清代皇家園林——靜寄山莊（已為遺址）與千像寺造像群整體環境的協調問題。同時也應注意將千像寺田野石刻保護與大遺址保護相結合……”見李家璘主編《天津文博論叢》第1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7-230頁。

⁴ 《盤山祐唐寺創建講堂碑銘並序》全文：

薊州軍事判官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李仲宣撰

燕京憫忠寺前左街僧錄判官法信大師賜紫沙門德麟書

夫幽燕之分，列郡有四，薊門為上。地方千裏，籍冠百城。紅稻香耕，寔魚鹽之沃壤；襟河控嶽，當旌戟之奧區。於古堞之外，西北一舍，有盤山者，乃箕尾之巨鎮也。深維地紉，高辟天門。暖碧凝霄，寒青壓海。珠樓璿室，抑窅窳於崑丘；寶洞瓊臺，耀磅礴於衡嶽。崆峒左倚，泰行右連，懷珠之水派其陽，削玉之峰峭其後。嶺上時興於瑞霧，穀中虛老於喬松。奇樹珍禽，異花靈草。絕頂有龍池焉，向早歲而能興雷雨；岩下有潮井焉，依旦暮而不虧盈縮。於名山之內，最處其嘉。此境舊有五寺，祐唐者乃備其一。自昔相傳，有尊者挈杖遠至，求植足之所。僧室東北隅，岩下有澄泉，恍惚之間，見千僧澤鉢，瞬息而泯，因茲構精舍宴坐矣。厥後於嶮穀礪石之面，刻千佛之像而以顯其殊聖也。雖雨漬苔斑，睽儀相而猶在；陽舒陰慘，流善譽而不墜。向此藍垣之北、長松之下，有大石焉，重萬餘鈞，或遇信敬者，微觸而動。迄今遊閱之士，冠蓋相望，四序不絕於阡陌也。當昔全盛之時，砌疊龍蟠，簷排鳳翅。晨鐘暮磬，上聞兜率。禪宗律學，宛是祇陀。駢闐可類於清涼，赫奕遙同於白馬，乃法侶輻湊之鄉也。爰自大兵之後，並已燼滅。繇謂物不可以久廢，故享利於德人。德人者即寺主大德，

堂碑”）、明嘉靖十五年（1536）四月八日立“千像祐唐寺重建碑”和“重修千像寺藏經殿碑”三座石碑，且均保存完好。後兩座碑刻主要介紹了千像寺明代重修的情況，而“講堂碑”記錄了遼代千像寺造像群創立之初的情景。該碑刻高 200 釐米、寬 93 釐米，額高 37 釐米、

乃當寺之景派也。厥木惟喬，其神不測，苦隨念盡，樂與人同。化六趣之忙然，歸十方之安隱。享年臘未晚，昌行業彌高，既多有緒之聞，宜示無窮之績。寺主大德，俗姓琅琊氏，釋諱希悟，鎮陽夏博人也。爰自聚沙之歲，禮當寺寺主在楚禪師授法焉。剷除五蓋，慕別四生。捨欲棹而誓泛慈舟，棄毒藥而願食甘果。年二十，詣東五臺山長興寺具屍羅。由啟弘願，筵僧一十萬，次第竟矣。於是謂其友曰：“聞二儀舒慘，四序推遷，人生幾何，歲不我與。覽斯基址，孰忍淒涼。野鹿群麋，晝夜而草眠香徑，壞碑毀塔，高低而蔓掛藤蘿。玉毫消盡於花鬢，金磬罷聞於齋懺。上漏下濕，日就月將。徐興再造之心，爰起從新之務。”於是乎，手披榛棘，力用經營，移怪石而截斷雲根，伐灌木而摧折煙色。應曆十二年，化求財贖，蓋佛殿一座。櫟榼娟妙，丹牘新鮮。塑佛中央，圖像四壁。保寧四年，又建櫛庫僧堂二座，俾雲羞之有所作也，賓旅之有所歸也。乾亨二年，加授紫衣。載議門迎廣陌，地處幽涼，虞生肇之徒見臨，顧講贊之所交闕，乃於僧室之陰，疊磷磷之石，澮瑟瑟之泉，高廣數尋，駢羅萬樹，薙除沙磧，俯就基坳。而又結邑人釀緡賂，四遠之最樂施者如介甲之歸巨浸也。即乃市木雲嶠，採石煙岩，窮巾斧之功，極磨礱之妙，初心纔啟，大廈攸成。式導昏衢，彌光世德。

其堂也，保寧十年創建，帶雲川之渺渺，總遠岫之峨峨。東觀種玉之田，西揆築金之闕。蘭楹鏤彩，桂柱凝丹，月入秋窗，風含夏戶。簷外之杉松鬱鬱，檻前之煙水潺湲。所貴安苾芻僧，置狻猊座。高談玉偈，燃慧炬而絕煩惱薪；妙演金文，揮智刃而剖無明殼。長依佛住，永壓山門。對延靈鷲之峰，闡說瑜伽之旨。此皆邑人等心猶慕善，志乃忘筌。知浮生石火以難停，覺幻質風煙而易滅。各抽淨施，共構良因，即寺主希悟大德激勸之所致也，緣惠之所被也。厥外，井有甘泉，地多腴壤，間栽珍果，棋布蔬畦。清風起兮綠櫛香，細雨霽兮紅葵茂。載諒鴻基必葺，白足鹹來，其供給之費，恆不闕於祇瞻者，大德寺主力辦也。蓋惟寺主大德，道洽空有，識洞幽明。全資化導於多方，以至圓成於能事。所冀皇朝，永安神器矣；相國之長，調鼎鼎矣；京尹之仁，無秕稗矣；郡牧之信，及竹童矣。一切含靈，同沾利樂；一切惑溺，並向真如。則寺主希悟慈悲之□□□也，修持之行根本也。拒藏舟不永，深谷翻高；爰述懿徽，俾雕翠琰。其邑人姓號，具列碑陰。

仲宣靡職之歲，華構方成，命修辭以敘之。敘之伊何？即為銘而紀之，曰：峭狀靈峰，創興華宇。式開講肆，用陳法侶。物置多人，利圓三寶。庶幾乎！作善之祥，傳名曠古。統和五年歲次丁亥四月癸巳朔八日丙時建。

攝始平軍節度推官潘延素刻字，同刻字人李緒。

寬 33 釐米，為遼知薊州軍事判官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李仲宣所撰，燕京憫忠寺前左街僧錄判官法信大師賜紫沙門德麟所書，攝始平軍節度推官潘延素和李緒所刻，碑刻書法行楷兼備，有唐代顏、柳之風，骨骼剛勁，被稱為“京東第一碑”。

千像寺石刻為“遼代佛教摩崖造像。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天津市薊縣官莊鎮盤山東麓。鐫刻於遼代。石刻造像分佈在千像寺遺址周圍的 124 處巨石或崖壁上，共有線刻造像 535 尊。造像題材有釋迦佛、彌勒佛、毗盧遮那佛、藥師佛、觀世音菩薩、地藏菩薩、弟子等。是迄今發現規模最大的遼代石刻造像群。”⁵ 這些石刻均分布在千像寺周圍約 0.4 平方公里範圍內，造像或坐或立，多與人等高，約 1.5–2 米。

關於對千像寺遺址的勘查工作，2003–2005 年天津市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對千像寺遺址進行了勘察，對石刻進行編號和登記，與專業測繪單位合作，對石刻所處地點進行定位，並提取了全部影像資料。2004 年形成了《天津薊縣盤山千像寺》的調研報告，但未公開發表。制定了“千像寺本體保護技術方案”和“千像寺造像文物保護規劃方案”，並召開“天津薊縣盤山千像寺石刻造像群專家論證會”，對方案進行研討論，並對千像寺的造像進行了考察，但會議紀要、綜述亦未見發表，僅從媒體披露中可探知部分考察結果。據查，千像寺造像均為遼代造像，其中有 91.4% 的造像表面附著苔蘚，有 392 尊造像石皮剝落，占比 73.27%，保護形勢比較嚴峻。2006 年 6 月，國務院公佈千像寺造像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文物局連

⁵ 見王巍《中國考古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 年，第 626 頁，李裕群編寫詞條。

續出臺關於千像寺造像文物的保護意見，2014年4月28日出臺《國家文物局關於千像寺造像文物保護規劃編制立項的批復》（文物保函[2014]第392號）；2014年6月6日出臺《對千像寺造像保護工程立項的批復》（文物保函[2014]1978號）；2015年9月7日出臺《國家文物局關於千像寺造像保護規劃的意見》（辦保函[2015]第1253號）。根據檔內容，國家文物局同意《千像寺造像保護技術方案》，並且經費已經到位，並於2015年4月13日開展招標工作，⁶目前工程尚在進行中。

學術界研究成果，現對千像寺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僅有兩篇：譚力、魏世豪發表的《天津薊縣盤山花崗岩風化特徵及其對千像寺石刻造像的影響》⁷和董佰國、張俊生、劉健發表的《天津市千像寺造像保存現狀及綜合保護構想》⁸，均為對千像寺線刻造像保護方面的論文。天津盤山風景名勝區管理局編纂的《盤山金石志》對千像寺三座碑刻和部分造像影像進行了著錄說明。另有筆名為風吹四野、七葉2013年發表在《當代人》的隨筆《行走盤山千像寺》⁹，從作者以散文的筆觸描繪了千像寺造像分佈的位置、形態，大致的歷史沿革。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天津薊縣盤山千像寺》的照片集一冊，為2004年7月製作，內含千像寺全景和佛像特寫照片202張，並附有天津盤山千像寺佛教石刻造像群平面圖，為2004年6月所繪製，為

⁶ 見《千像寺造像保護技術方案招標公告》，2019年8月19日讀取

<https://www.bidcenter.com.cn/newscontent-19997269-1.html>

⁷ 譚力、魏世豪《天津薊縣盤山花崗岩風化特徵及其對千像寺石刻造像的影響》，《安全與環境工程》2017年第1期，第11-15頁。

⁸ 董佰國、張俊生、劉健《天津市千像寺造像保存現狀及綜合保護構想》，見李家璘主編《天津文博論叢》第1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7-230頁。

⁹ 風吹四野、七葉《行走盤山千像寺》，《當代人》2013年第10期，第46-49頁。

研究千像寺造像提供了基礎資料，但是對千像寺碑刻、造像的宗教、歷史文化價值的研究發掘還沒有展開。

二、千像寺造像群與密教信仰

中國密教受到中外學者有廣泛的關注，在研究地域上四川、雲南、山西、廣東、福建、內蒙古、北京、天津等省、自治區直轄市，敦煌、江南等地都有涉及，研究熱點集中在敦煌、龍門、大足、寶頂山、法門寺等，成果較為豐富。時間上涉及遼代密教遺跡研究的主要成果主要有：陳術石和佟強《從興城白塔峪塔看遼代佛教的密顯圓通思想》，張明悟《〈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與遼晚期密教之流行》，彭曉靜的《從陀羅尼經幢看遼代的密教信仰》以及于博的《遼塔密教圖像義蘊考——兼及對圖像配置的探討》和《從遼塔造像看密教對遼代七佛造像的影響》等。相對來說學界對於遼代幽、薊地區的密教關注度較低，研究成果較少，現有的主要集中在房山石經遼刻《發菩提心戒》和薊州區獨樂寺、白塔寺。而對於千像寺造像的密教信仰文化特徵尚沒有人研究涉及。

千像寺造像多刻於危崖巨石之上，排布看似雜亂無章，實則從佛像的位置分佈（見圖 1）、形態特點，以及題材內容來看，無不反應了遼代當地密教信仰的特徵。

（一）造像群的分佈

清代李天馥（1635–1699）的《遊千像寺》一詩生動描繪了千像寺險絕縱橫的環境：“俯臨絕穀仰巔岼，木杪行來路幾盤。亂石縱橫疑虎伏，怪松詰曲學龍蟠。飛梁澗溜泠泠雨，重閣天風冽冽寒。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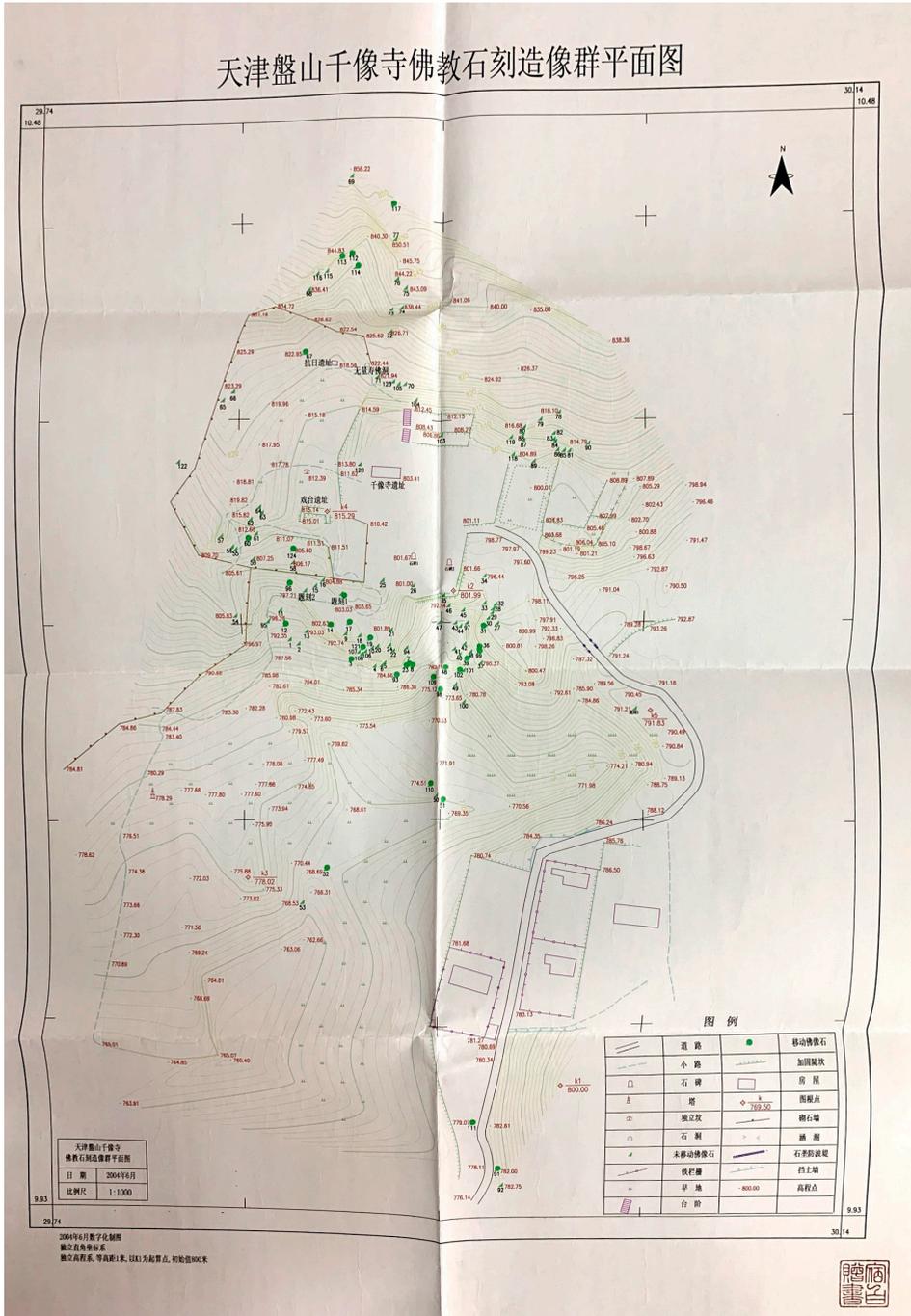


圖 1 天津盤山千像寺佛教石刻造像群平面圖 (圖片來源:《天津薊縣盤山千像寺》圖集, 非出版物, 北京: 北大圖書館藏, 2004年, 第1頁)

恐山靈嫌俗客，忍拋嵐翠事征鞍！”¹⁰ 從詩中可知當時千像寺處於前臨絕穀，後倚高山的位置，周圍亂石叢生，有山澗清流流經寺前的山谷，寺廟是多層的閣樓建築，有絕佳的視野。從千像寺佛教石刻造像群平面圖來看，以千像寺為中心，造像集中分佈在寺的正北、正南、東北、西南的位置。在寺院遺址的正後方坡面上有大日如來佛造像一尊（見圖2），佛像坐在蓮花寶座上，手結智拳印，位於造像群的比較中心的位置，此造像雖風化嚴重，但仍可見面容飽滿，眉間有白毫，雙目微睜，有三層頭光和背光，坐於仰蓮之上，法相莊嚴。



圖2 大日如來像（《天津薊縣盤山千像寺》圖集，非出版物，北京：北大圖書館藏，2004年，第75頁）

¹⁰ 《盤山志補遺》卷二，智樸纂，王士禛、朱彝尊較訂，吳夢麟、劉衛東校點，北京：中國書店，1997年，第371頁。

據乾隆皇帝在乾隆十年(1745)造訪千像寺時,所作題為《如來影》一詩,他在序中說:“盤山千像寺石上有如來影像,詩以詠之”,詩云:“如來無物不如來,無物不如本無物。豈於石上獨留跡,得毋此石非真佛?無物非佛,石豈獨非?互劫色相,不長苔衣。君不見古德跣趺背佛殿,自謂能參言語斷。”¹¹所描述如來像獨刻在一塊巨石上,且石上不長苔衣,位置在佛殿背後,故造像群靠中心位置的這尊造像應為詩中所頌的大日如來。

在不空譯《金剛頂瑜伽略述三十七尊心要》中詳細描述了大日如來的方位和形象:“應知其中方毘盧遮那佛,即如來部也。報身圓滿,萬德莊嚴,於須彌盧頂寶峯樓閣大摩尼寶殿,坐金剛臺,成等正覺。降伏眾魔,於諸毛孔放大光明。十方如來及諸聖眾,鹹來同證。十地滿足菩薩,皆歸此會,各處本方座位,住三摩地心。皆從毘盧遮那如來心內智中,流出無量無邊祕密法門。菩薩修行,相應三昧,瑜伽理智,滿法界心。此大菩提五智圓滿,即毘盧遮那如來真如法界智,處中位也。”¹²由此可知,在金剛界曼荼羅中大日如來位於密宗諸佛的中心。

而在造像群的最北方向的佛像為北方不空成就佛(見圖3)。佛像鑿刻在一塊金色岩石上,線條清晰完好,佛像疊腳坐在蓮花寶座上,有兩層透光三層背光,左手執衣,右手為無畏印。

《諸佛境界攝真實經》對這一手印有詳細解釋:“第五結無怖畏印,左手如前,次舒右五指,以掌面向外,入北方不空成就如來三昧。

¹¹ 吳景仁主編《乾隆薊州詩注釋》,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第50頁。

¹² 不空譯《金剛頂瑜伽略述三十七尊心要》,《大正藏》編號871,第18冊,第292頁上欄第28行至中欄第8行。



圖3 不空成就佛像（圖片來源：《天津薊縣盤山千像寺》圖集，非出版物，北京：北大圖書館藏，2004年，第69頁）

當觀佐字色，及我身盡北方界，並與九方無量世界諸佛菩薩、一切眾生、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悉皆五色。以何因緣名無怖畏？謂備四義，稱無怖畏。一者中方毘盧遮那如來，能滅無明黑暗，出生般若波羅蜜，等盡虛空界，洞達光明。二者東方不動如來，能摧一切頻那夜迦、惡魔鬼神等，悉令不動。三者南方寶生如來，能除貧乏，施天宮殿、天飲食、天衣服、天音樂，悉皆圓滿。四者西方無量壽如來，能與行者三昧大樂，譬如十方虛空無量無盡，亦如眾生無量無盡，亦如煩惱無量無盡。如是瑜伽行者三昧大樂，亦復無量無盡。如是四義具足圓滿。是故北方不空成就如來，告行者言：‘善男子善女人，汝勿怖畏。’由是義故，名無怖畏印。”¹³ 據此，持無畏印者在密宗中當為不空成就佛，而其方位正為北方，那麼千像寺石像的排布應是按照密宗五方佛的位置來安排。以大日如來為中心，北方有不空成就佛，東方應有不動如來，南方應有寶生如來。因為千像寺的造像剝蝕毀損嚴重，且測繪的資料未能全部公開，能辨識的造像有限，還不能完全確定其他幾尊佛像的位置。

（二）造像的形態特點

據考察結果，千像寺造像均為遼代所造。遼為契丹所建，自西元 916 年建朝至西元 1125 年滅亡，幾乎與五代（907–960 年）至北宋（960–1127 年）相同時。佛教在契丹民眾間盛行，據日本學者野上俊靜的論述，遼統治者因佛教屬夷狄之教相對漢地的儒道更便於利用以加強自己的統治，也對其十分親厚。¹⁴ 遼代佛學思想豐富融通，

¹³ 《諸佛境界攝真實經》卷一，《大正藏》編號 868，第 18 冊，第 276 頁上欄第 18 行至中欄第 5 行。

造像形式多樣，“其中石刻佛像多以浮雕形式出現在佛塔、經幢和舍利石函上。”¹⁵“遼代密教的來源非常複雜，其以開元三大所傳純密為框架，糅合契丹薩滿教的成分，並吸收西域（回鶻）和漢地佛教中的密教內容加以系統化而成。”¹⁶但據已發現的遼代曼荼羅排布特徵，多為金剛界曼荼羅。

學者于博在其論文《遼塔密教圖像義蘊考——兼及對圖像配置的探討》中的論述，遼代有以“塔的中心象徵大日如來，由此形成用密教金剛界五方佛和八大靈塔構成遼密的空間佈局。”如朝陽北塔，並且在其天宮出土了四重相套的遼塔，最外重為金片刻八大靈塔曼荼羅，地宮內的八角棱柱經幢也刻有八大靈塔。金片刻八大靈塔曼荼羅‘主尊為結智拳印大日如來，跏趺坐蓮花座，戴寶冠，項飾’，如下圖：



圖4 金片刻八大靈塔曼荼羅¹⁷

¹⁴ 野上俊靜著，楊曾文譯《遼朝與佛教》，《佛學研究》，2011年第1期，第201-215頁。

¹⁵ 于博《遼塔密教圖像義蘊考——兼及對圖像配置的探討》，《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2015年第5期，第112-113頁。

而據學者韓偉的研究，扶風法門寺出土的晚唐寶函成身會圖像，則呈現金剛界大日如來與四波羅蜜菩薩的組合圖像，且為中國現存僅見的唯一一處。¹⁸ 千像寺造像以大日如來像為中心，其排布與金剛界曼荼羅不無關聯，在創造之初也有可能為密教大曼荼羅之用。

如圖所示，千像寺的大日如來、不空成就佛像面頰豐滿，身軀寬厚，坐於仰蓮之上，寶相莊嚴。造像群中的立像與人幾乎等高，比如圖 5 中的四尊菩薩像，衣褶繁複，線條生動，有搖曳之感，胸前袒露較多，高矮錯落，神態不一。他們手持各種法器，如圖 5 最左面的佛像右手持一長物，形似禪杖，其他佛像以托鉢者居多。

千像寺石刻雖為摩崖線刻，工藝粗糙，藝術水準並不高超，但是頗具遼代佛像的典型特徵，比如有學者總結遼代佛教造像“衣紋在膝關節處多有三四條，平行看上去呈縱列平行狀的短線，這種縱列短衣紋在宋代造像上和其他時代則很難見到。另外還有一個特點更為突出，在遼代的部分佛像的兩小腿的部分各有一條婉曲如小蛇一樣的衣紋，有些在上衣袖口上也可以見到這種小蛇一樣的衣飾，其衣紋彎曲的弧度曲折生動，這個特點不僅在遼代的佛像上可以看到，就是在遼代的木刻上，佛經、塔寺的佛像和壁畫上也都可以見到，這種特點在華北地區表現的更為突出據。”¹⁹ 這些特點在千像寺造像群就有直觀的顯現。

¹⁶ 謝繼勝、常紅紅《莫高窟 76 窟〈八塔變〉及相關的幾個問題——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中國多民族美術關係史研究》，中山大學藝術史研究中心編《藝術史研究》第 13 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207-50 頁。

¹⁷ “朝陽北塔經塔大日如來與八塔線圖”，轉載自于博《遼塔密教圖像義蘊考——兼及對圖像配置的探討》，來源王晶辰、董高、杜斌主編《朝陽北塔考古發掘與維修工程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 92 頁。

¹⁸ 韓偉《法門寺唐代金剛界大曼荼羅成身會造像寶函考釋》，《文物》1992 年 8 期，第 43-56 頁。



圖 5 四菩薩像（筆者拍攝）

（三）“千僧澤鉢”的題材

遼僧續編的《一切經音義》解說道“曼荼（荼）羅或云曼吒羅、具足、應云摩賀曼拏上聲攞，此云大壇，即眾聖集會所。”²⁰“講堂碑”記載了此處開鑿佛像的起因：“此境舊有五寺，祐唐者乃備其一。自昔相傳，有尊者挈杖遠至，求植足之所。僧室東北隅，岩下有澄泉，恍惚之間，見千僧澤鉢，瞬息而泯，因茲構精舍宴坐矣。厥後於巉穀礪石之面，刻千佛之像而以顯其殊聖也。雖雨漬苔斑，睠儀相而猶在；陽舒陰慘，流善譽而不隳。”是因為有高僧看到澄泉邊上有“千僧澤鉢”，並且“因茲構精舍宴坐矣”，這正是眾聖集會的場面，而寺院自發將此場景刻於石上，也是為“顯其殊聖”。那麼“千僧澤鉢”則是千像寺石刻群主要表現的佛教題材，其石刻



圖 6 托鉢僧人（圖片來源：《天津薊縣盤山千像寺》圖集，非出版物，北京：北大圖書館藏，2004 年，第 26 頁）

形態如圖 6 所示，體現了深刻的佛教思想內涵。

“千僧”或者說“千佛”題材發端於舍衛城經變，在《长阿含经》等佛教经典中有所记载，²¹ 在阿旃陀、克孜爾石窟壁畫中有直觀的呈現，先由幻化雙神，而後演化為千佛，本為講述佛陀在舍衛城顯示神跡馴服外道的佛傳故事。後在大乘佛教的經典《大方等如來藏經》中詳細刻畫成“大光明神變”稱：“爾時世尊於栴檀重閣，正坐三昧而現神變，有千葉蓮華大如車輪，其數無量，色香具足而未開敷，一切花內皆有化佛，上升虛空彌覆世界猶如寶帳，一一蓮花放無量光，一切蓮花同時舒榮。佛神力故，須臾之間皆悉萎變，其諸花內一切化佛結加趺坐，各放無數百千光明，於時此刹莊嚴殊特，一切大眾歡喜踴躍，怪未曾有鹹有疑念：‘今何因緣，無數妙花忽然毀變？萎黑臭穢甚可惡饜。’”²² 神變描繪了佛顯神力在千蓮中顯示千佛，“一切花內皆有佛”，而蓮花忽然萎靡，開示眾生應摒棄貪欲嗔癡，滅滅諸煩惱。不僅傳承了原始佛教離苦得“道”的基礎思想，更體現了大乘空宗“法我皆空”的思想。

而隨著密宗的發展，這一佛傳故事在不空所譯《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中演化為大聖曼殊室利菩薩現千臂千手千鉢金身，鉢中顯現千佛的神跡。經云：“如是我聞：一時，釋迦牟尼如來在摩醯首羅天王宮中，於毘楞伽寶摩尼寶殿中。如來在

¹⁹ 趙國棟《遼代佛像的鑒定》，《草原文物》2015年第1期，第109-115頁。

²⁰ 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卷一，《大正藏》編號2129，第54冊第935頁下欄第24行。

²¹ 見佛陀耶舍、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十三，《大正藏》編號001，第1冊，第87頁上欄第29行至下欄第18行。

²² 佛馱跋陀羅譯《大方等如來藏經》卷一，《大正藏》編號666，第16冊，第457頁上欄第23行至下欄第8行。

百寶摩尼寶座上，與共毘盧遮那如來，於金剛性海蓮華藏會，同說此經。與無量大梵天王等，並與微塵數一切菩薩摩訶薩眾說，毘盧遮那如來法界性海祕密金剛界蓮華臺藏世界海。於中有大聖曼殊室利菩薩，現金色身，身上出千臂千手千鉢，鉢中顯現出千釋迦，千釋迦複現出千百億化釋迦。”²³ 釋迦說法，大聖曼殊室利菩薩顯示金身，是為了證入佛心金剛聖力，從而令一切菩薩及眾生修此最上大乘殊勝法教，體現了密宗追求身法意相結合得果位的圓滿境界的思想。

另一方面，佛鉢替代了蓮花承載千佛，這同樣體現了大乘佛教顯密思想的變遷。學者孫英剛、李建欣指出“佛鉢本質上是一種舍利，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它被認為是佛法的象徵。”²⁴ 學者呂建福認為千鉢文殊形象是密教和五臺文殊信仰相結合的產物。密宗將鉢與如來、文殊相結合，作為開示神力的載體，是借鑒了《大日經》中釋迦牟尼的三昧耶形——寶鉢²⁵。據“講堂碑”載：“寺主大德，俗姓琅琊氏，釋諱希悟，鎮陽夏博人也。爰自聚沙之歲，禮當寺寺主在楚禪師授法焉。剿除五蓋，慕別四生。捨欲棹而誓泛慈舟，棄毒藥而願食甘果。年二十，詣東五臺山長興寺，具屍羅，由啟弘願，筵僧一十萬，次第竟矣。”如其言，千像寺是希悟大師（生卒年不詳）一手創立中興的，而當時寺廟的宗派思想當與五臺山相通。故而千像寺的“千僧澤鉢”題材的石刻，有和五臺山一脈相承的由遼早期的唐密向後期顯密結合轉化的信仰特徵。

²³ 不空譯《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卷一，《大正藏》編號1177A，第65冊，第725頁上欄第26行至中欄第9行。

²⁴ 孫英剛、李建欣《月光將出、靈鉢應降——中古佛教救世主信仰的文獻與圖像》，《全球史評論》2016年第2期，第109-140頁。

²⁵ 呂建福《千鉢文殊的產生及其影響》，《五臺山研究》1994年第3期，第7-12頁。

綜上所述，通過對千像寺碑刻、造像、傳說進行分析梳理，以及對其造像形態風格與分佈均呈現出的顯著的密教特徵進行的解析，可知遼代時期的古薊州是密教在華北地區傳播的樞紐重鎮。據“講堂碑”介紹，千像寺講堂於保寧十年（978）創建，是高談玉偈，妙演金文之所在。“對延靈鷲之峰，闡說瑜伽之旨。”通過說法傳教，可使當地民眾願意各抽淨施，共構良因。並且“載諒鴻基必葺，白足鹹來，其供給之費，恒不闕於祇贍者”甚至希悟的能量能夠達到“全資化導於多方，以至圓成於能事”。那麼千像寺在當時也成了官方祝禱祈福的宗教場所，其密教的信仰應影響到上至郡縣官員下至當地百姓，是古薊州政治社會文化的一個縮影。

參考文獻

原始文獻

- 《大方等如來藏經》一卷，（東晉）佛馱跋陀羅（359–429）譯於420年，《大正藏》編號666，第16冊。
- 《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十卷，（唐）不空（746–774）譯，《大正藏》編號1177A，第20冊。
- 《金剛頂瑜伽略述三十七尊心要》一卷，（唐）不空譯，《大正藏》編號871，第18冊。
- 《長阿含經》二十二卷，（後秦）佛陀耶舍（4–5世紀）、竺佛念（活躍於399–416）譯於412–413年，《大正藏》編號001，第1冊。
- 《（欽定）日下舊聞考》一百六十卷，（清）英廉（1707–1783年）等編成於1788年，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乾隆薊州詩注釋》，吳景仁主編，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第50頁。

《盤山志補遺》十四卷，（清）智樸（活躍於康熙年間）1691年纂輯成，王士禛、朱彝尊較訂，吳夢麟、劉衛東校點，北京：中國書店，1997年。

《盤山祐唐寺創建講堂碑銘並序》，（遼）李仲宣987年撰，統和五年（987）建。

《諸佛境界攝真實經》三卷，（唐）般若（活躍於741–798）譯，《大正藏》編號868，第18冊。

《續一切經音義》十卷，（遼）希麟（960–1127）編纂，《大正藏》編號2129，第54冊。

東亞語研究

《千像寺造像保護技術方案招標公告》，2019年8月19日讀取，<https://www.bidcenter.com.cn/newscontent-19997269-1.html>

《天津薊縣盤山千像寺》圖集，北京：北大圖書館藏，2004年。（非出版物）

于博《遼塔密教圖像義蘊考——兼及對圖像配置的探討》，《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2015年第5期，第112–113頁。

王晶辰、董高、杜斌主編《朝陽北塔考古發掘與維修工程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王巍主編《中國考古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年。

吳景仁主編《乾隆薊州詩注釋》，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

呂建福《千鉢文殊的產生及其影響》，《五臺山研究》1994年第3期，

第 7-12 頁。

林保堯《遼、金、西夏造像藝術》，《東方收藏》2011 年第 2 期，第 24-27 頁。

風吹四野、七葉《行走盤山千像寺》，《當代人》2013 年第 10 期，第 46-49 頁。

孫英剛、李建欣《月光將出、靈鉢應降——中古佛教救世主信仰的文獻與圖像》，《全球史評論》2016 年第 2 期，第 109-140 頁。

梁思成《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 3 卷第 2 期（1932 年），第 1-92 頁。

野上俊靜著，楊曾文譯《遼朝與佛教》，《佛學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201-215 頁。

楊志玖《關於漁陽、範陽、薊縣的方位問題——並論〈重修薊縣誌〉的錯誤》，《天津社會科學》1983 年第 2 期，第 61-63 頁。

趙國棟《遼代佛像的鑒定》，《草原文物》2015 年第 1 期，第 109-115 頁。

薑佰國、張俊生、劉健《天津市千像寺造像保存現狀及綜合保護構想》，李家璘主編《天津文博論叢》第 1 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227-230 頁。

謝繼勝、常紅紅《莫高窟 76 窟〈八塔變〉及相關的幾個問題——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中國多民族美術關係史研究》，中山大學藝術史研究中心編《藝術史研究》第 13 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207-250 頁。

韓偉《法門寺唐代金剛界大曼荼羅成身會造像寶函考釋》，《文物》1992 年 8 期，第 43-56 頁。

譚力、魏世豪《天津薊縣盤山花崗岩風化特徵及其對千像寺石刻造像的影響》，《安全與環境工程》2017 年第 1 期，第 11-15 頁。